

仍在流血的傷口

——日本否認戰爭罪行及其人權上的效應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大片土地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日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歷史戰爭罪的責任，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與對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歉，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日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持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果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剝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這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係。

關鍵詞：日本，戰爭罪行，人權。

前言

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的許多地方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例：人體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性奴隸政策，逮捕與酷刑對付老百姓，殺戮無辜，食人，等等)。這些暴行之證據，大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正式簽署投降之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毀滅和掩蓋。

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拒絕起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到一九五八年底，所有日本戰犯，包括甲級、乙級和丙級，從監獄被釋放而獲政治上平反。不但得赦免，已故的戰犯也供奉於靖國神社受崇拜和尊

敬。然而，不但沒有正式道歉，日方還否認戰爭罪行，甚至在他們的教育體系中扭曲這些歷史事件。

日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戰爭罪的責任，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與對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歉，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日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持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果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剝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這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係。

東亞創傷的歷程

日本帝國在一八七六年開始侵略朝鮮的計劃，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從政治與經濟逐步合並朝鮮，改名大韓帝國，又於一九〇五年脅迫大韓帝國與其締結《日韓保護協約》(即第二次日韓協約，又稱乙巳條約)，日本褫奪了韓國的外交權，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韓國。韓國由此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帝國然後用一九一〇年簽訂《日韓合並條約》，來全面吞並了朝鮮半島，廢除了朝鮮王朝，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其統治方式是「武斷統治」：雖鼓吹著「內鮮一體」(內，指日本本土)，政策是對朝鮮實施赤裸裸的經濟掠奪，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利和自由。

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的許多地方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這些暴行之證據，大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正式簽署投降之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毀滅和掩蓋。

日本全面吞並朝鮮半島，廢除了朝鮮王朝，其統治方式是「武斷統治」：雖鼓吹著「內鮮一體」，政策是對朝鮮實施赤裸裸的經濟掠奪，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利和自由。

三]。

2. 使用化學武器

據史學家吉見義明和星矢松野的研究，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軍隊開始全面對中國軍隊使用光氣、氯氣、路易氏毒氣、噁心氣、芥子氣。因日方利用生物戰，大概二十萬名中國人直接死於鼠疫、霍亂、炭疽病和其他疾病[注四]。

3. 南京大屠殺

日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佔南京。根據中國和西方目擊者的描述，日本軍隊在六周內慘殺大約二十萬[注五]至三十萬[注六]多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戰士，犯下大規模的強姦、搶劫、盜竊、縱火諸戰爭罪行。

4. 強迫勞動

日軍使用強迫勞動直接造成很多死亡，因為勞工經常被分配到極危險而無足夠的安全防範措施的工地或條件。根據一項歷史學家聯合的研究報告，超過一千萬中國平民被日本亞洲發展局(KOA-IN)分配為強迫勞工[注七]。在緬甸日本強迫三十萬多平民和戰俘勞工(日本稱勞務者)建設泰緬鐵路，估計一半死亡，也稱死亡鐵路[注八]。

5. 慰安婦

在戰爭及之前時期，日本在征服區域強迫婦女和女孩成為性奴隸。根據中國來源的估計，慰安婦有三十六萬到四十一萬人[注九]。他們經歷了身體上的折磨、強姦、毆打等等獸行。結果，慰安婦死亡率超過四分之三。大多數倖存者由於性病感染[注十]，流產和創傷，成為不育。被關東軍俘虜成為性奴隸的澳裔女子Jan Ruff-O'Herne於一九九〇年到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作證。她說：「最可恥二戰期間的故事，是日本犯下最邪惡的人權侵犯，乃jugunianfu(從軍慰安婦)的故事，他們如何將這些不志願的婦女強暴扣押為日本提供性服務。我在『慰安所』白天和黑夜受到系統性的毆打和強姦。即使日本醫生來參觀妓院

日本殘暴的殖民統治導致朝鮮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朝鮮人對日本殖民當局的不滿與日俱增，為了抵制日本殖民當局佔領和霸道行為，紛紛舉行非暴力抗議示威。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寶塔公園一次大規模和平抗議運動中(朝鮮語指：三一運動，삼일운동)，日本員警和軍隊屠殺了七千人[注一]。這事件開始反映日本自己長期壓迫東亞鄰國的人權。

一九三一年，日軍侵略中國東北，隨後開始對中國人民犯下進行暴力和種族滅絕的行為。日本關東軍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以對方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按照自己精心策劃的陰謀襲擊瀋陽。經過五個月的戰鬥，日軍完全佔領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二年，強行頒佈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利用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登基為傀儡領導者。

日本軍繼續侵略中國其他北部地方。其軍隊直接到達進入北京的盧溝橋。中國軍吉星文團長(第二一九團，第三十七師，第二十九路軍)把守著盧溝橋，捍衛北京。日軍不但沒有停止進軍，而且還詭詐的開火，進攻盧溝橋及旁邊的鐵路橋。盧溝橋事變直接爆發了日本和中國之間全面戰爭。日軍在許多戰役上進行十分可怕的屠殺，如平津作戰、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略和佔領中國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才向中國和其他的同盟國投降。

日本政府的戰爭罪行

在侵略與佔領朝鮮和中國許多地方期間，日軍犯下無數戰爭罪行，最低限度包括：

1. 人體實驗

日本隱蔽的生物和化學戰研究和開發單位，被稱為七三一部隊[注二]，進行了對平民和戰俘生化武器實驗。根據二〇〇二年國際細菌戰研討會，日軍使用細菌戰和人體實驗過程中殺害大約五十八萬人[注

檢查我們是否有性病，每次來了他也強姦我」[注十一]。

6.逮捕和酷刑對付老百姓

在被佔領的地區，日本憲兵隊（Kempeitai）或日本當局不需用什麼正當理由來逮捕平民，甚至拷打被監禁的和處決的政治對手。所有中國及異國被征服人民，受逼向每位軍人叩頭。日本國民的民權是優於其他國籍擁有者。

7.大規模殺戮

據R.J.魯梅爾(R.J. Rummel)教授估計，從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注十二]，日軍謀殺超過三百萬至一千萬人，最有可能為六百萬。被殺害者屬中國、印尼、韓國、菲律賓、印度支那，和來自西方的戰俘。僅在中國，大約有三百九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平民，死於日軍手中，而一千二百萬人直接在戰爭過程中被殺[注十三]。拉梅爾說：「這大屠殺是由於日本文化概念，不人道的政治與軍事戰略，軍事便利權和定制」[注十四]。

8.食人

一位印度戰俘蘭斯奈克哈它阿里(Lance Naik Hatam Ali)，在新幾內亞作證，並指控，「……日軍開始選擇囚犯，每天一個囚犯被取出來殺給戰士們吃。我個人看到了這事情，有一百多名囚犯在這個地方被日軍吃掉了。其餘的我們被帶到另一個五十英里[八十公里]路程的地方，在那裏有十名犯人病亡。在這裏，日軍又開始選擇囚犯來吃。被選的就帶到一間小屋，把肉從還活著的人身上割下。然後就扔他們進溝裏待斃」[注十五]。

由檢察官威廉·韋伯(William Webb)調查報告在東京法庭指出，日本人員對盟軍戰俘犯了食人罪。

毀滅和掩蓋證據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於東京灣正式簽署投降之前，大部分所陳述的暴行證據，都被當時日本政府毀滅和掩蓋了。大量

的記錄有關日本領導人，其中包括天皇的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已被燒毀。日本帝國陸軍、海軍，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的罪證檔案都俱摧毀了[注十六]。

按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文件，「當日本已經明顯將被迫投降，它以組織性的努力，焚燒及銷毀所有文檔物證和其他關於虐待戰俘和平民囚犯證據。日本戰爭部長大臣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發佈命令給陸軍司令部應立即燒毀所有的機密文件。就在同一天，日本憲兵隊（Kempeitai）指揮官發出詳細指令到各個憲兵總部，要用有效的方法燒毀大量檔案」[注十七]。

以系統性破壞有關戰爭的記錄，好讓日本歷屆政府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責任。當戰後的日本一再否認戰爭罪行的責任，它也破壞其作為一個民族聲稱促進和平和人權信譽。由於日本否認其戰爭罪行，它仍然繼續傷害那些受害國家就像撒鹽在還流血傷口上。

戰後的人權問題

侵犯人權的犯罪分子，如果否認罪行或不肯表示悔恨其罪，都等於認同自己歷史上違逆人權的暴行。這認同是一種默默踐踏人權的方式，因為預設侵犯人權的行為，就是以為自己沒有什麼錯，是對所犯的罪行逃避責任。因此，一個國家的戰犯如果犯了侵犯人權罪，這國家必須代表他們向受害者承認罪行並道歉，才能證明其民族是有榮譽和尊重人權的。

日本帝國政府及其軍隊犯了前面所提的戰爭罪行，毫無疑問是侵犯他人身體和精神，是殘害人權。更嚴重的是，當日本持續否認罪行及辯解這些事件時，它實在蔑視人權。因此，即使日本現在聲稱促進世界和平和人權，它的周邊國家，如中國和韓國，常質問日本對人權的誠意何在？為了啟動和好進程，日本政府，包括國會或議會，應當對受害的國家作一個全體正式公開道

以系統性破壞有關戰爭的記錄，好讓日本歷屆政府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責任。當戰後的日本一再否認戰爭罪行的責任，它也破壞其作為一個民族聲稱促進和平和人權信譽。

為了啟動和好進程，日本政府，包括國會或議會，應當對受害的國家作一個全體正式公開道歉。然而藉著種種政治干預，戰後日本仍在蔑視人權，拒絕作出道歉，也拒絕履行和好的要求。

歉。

然而藉著種種政治干預，戰後日本仍在蔑視人權，拒絕作出道歉，也拒絕履行和好的要求。

1. 裕仁天皇擺脫法院公審

赫伯特(Herbert P. Bix)教授研究指出，戰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日本裕仁天皇是日本帝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深入參與軍事侵略的日常管理。在帝國總部[注十八]，通過各御前會議，他參加策劃所有軍事侵略，實際指導戰爭的進展。

但是，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反對任何公審裕仁天皇作為戰犯的計畫。麥克亞瑟認為，如果天皇被起訴而定罪為戰犯，其管理戰敗的日本將變得極困難。似乎只有當天皇與佔領盟軍合作，麥克亞瑟才能控制日本。這建議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支持，因此僅僅以政治利益為理由，日本首席罪魁逃脫了被控告。麥克亞瑟還免除刑事檢控所有捲入戰爭的日本皇室諸位親王，如秩父宮雍仁親王，朝香宮鳩彥王，竹田宮恆德王，和東久邇宮稔彥王。由於包庇裕仁天皇被起訴，美國奠定了方便日本拒絕承認其戰爭罪感和戰爭罪行基礎。

這事件的邏輯推理必然就是：如果佔領盟軍拒絕起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那麼很多日本人會認為他是無辜。從這推斷，邏輯結論就是：如果作為民族代表的天皇，已被裁定無辜，那麼日本這國家，也自然免了戰爭的罪行。

真相是，麥克亞瑟姑息了日本天皇及政府的罪惡，等同默認這些罪惡是正確的，亦即認為殘害人權是無罪的。

2. 大部份殺人戰犯被免罪責

在東京，盟軍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為審判日本戰犯嫌疑人。從幾百人被告名單裏，只有二十五位實際上經過審判而被判刑。執行了七位被判死刑，另十八位獲得監獄服刑代替死刑。在執行這七位「甲級」戰犯服刑後，一九四八年十二

月麥克亞瑟將軍釋放被拘留的「甲級」戰犯。到一九五八年底，所有日本戰犯，包括「甲級」、「乙級」和「丙級」，都從監獄釋放，全部得到政治上平反其罪行。

關於日軍七三一部隊，那些軍人對活的戰俘進行生物實驗的，也逃脫起訴，因為麥克亞瑟將軍期望他們獻給美軍高級生物及化學戰的研究。麥克亞瑟給予對日本七三一部隊指揮官與生物單位工作人員起訴豁免權，以換取他們的研究。

德國在戰後，展開了密集的反納粹化過程，前納粹分子被阻止進入議會或當官。但是美國卻允許日本戰犯進入議會，並在政府機構工作。在這些曾被定罪為「甲級」的日本戰犯，還能夠在一九五七年當日本首相。另外，戰後日本政府內閣，也有兩個「甲級」戰犯擔任部長職位。戰爭期間當過外相的重光葵，在戰後的鳩山政府裏得到重新任用。興教卡亞是戰時財政部長，戰後在池田勇人的政府當司法部長。

3. 已故的戰犯供奉靖國神社，獲得榮譽、崇拜和尊敬

靖國神社是由明治天皇創立於一八六八年來紀念對日本帝國有功人物。現今列在神社的名單有二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男女和兒童，包括一千零六十八名戰犯，其中十四名是「甲級」的罪犯。實質上，日本領導者毫無忌憚參拜靖國神社就引起過去侵略壓迫亞洲國家的紛紛批評與譴責。

最後在一九五八年假釋所有監牢中的戰犯，同時在一九五九年，衛生和福利部開始遞交靖國神社「乙級」和「丙級」戰犯名單。到了一九六六年，神社也被提供十四個最突出的「甲級」戰犯，其中包括戰爭期間的總理和高級將領，並在一九七〇年間神社通過決議供奉這些人。神社大祭司，頭長吉松平，違抗了東京戰犯法庭的判決，並在一九七八年用隱蔽儀式供奉「甲級」戰犯。

靖國神社博物館和網站竟然怙惡不

俊的批評美國，辯解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攻擊美國，是因為受到美國的「逼迫」，而且又聲稱日本發動戰爭，源於建立「大東亞共榮圈」(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的理想[注十九]。這種口蜜腹劍的花言巧語，仍在追隨戰時政權所創的侵略藉口，及其意識形態和宣傳。

日本國會圖書館在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發佈了一本檔案名為「對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新編材料」，披露有八百零八項，其中包括近一百八十件檔案是神社第一次揭發的。在這些檔案中，列出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起，靖國神社官員與衛生和福利部人員之間的會議，討論誰能夠供奉在靖國神社內。該檔案指出，靖國神社與衛生和福利部共同認為「甲級」戰犯應受到尊榮。據該檔案，日本政府直接參與及影響供奉戰犯。它又證明了安倍晉三首相欺騙全世界，他曾否認日本政府對於誰會被供奉有發言權。

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日本政界包括首相和其他內閣成員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天，當時的首相三木武夫，以非政治的身份來參拜靖國神社。第二年，他的繼任者福田赳夫，也用非政治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但他以日本首相簽署在留言簿上。其他幾個日本首相，如大平正芳（一九七九年），鈴木善幸（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中曾根康弘（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並以政府資金支付該提供的花），宮澤喜一（一九九二年，秘密保持直到一九九六年），橋本龍太郎（一九九六年），和小泉純一郎（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都參拜了靖國神社。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每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招致鄰國的官方譴責，因視為日方企圖合法化過去的軍國主義。

4.沒有正式道歉

因美國領導的盟國不願公審裕仁天皇

作為戰犯，許多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民族他們對戰爭罪行是不需負責的。把全盤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都歸咎於背叛了天皇和人民的日本軍隊。因此，日本政府不承認日本在戰時有違反國際法或條約。多年來，日本政府只正式承認其軍隊所造成的痛苦，因此日本政府也發出過一些道歉，但其道歉是有限地承認軍隊的罪行，卻不代表國家及議會。對受害國家，日本政府及其議會一直沒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公開道歉。

村山富市首相是唯一不屬右翼自民黨首相，他公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表示，日本「通過殖民統治和侵略，造成了許多國家人民的巨大損害和痛苦，特別是亞洲的國家」，並表示他的「深刻反省的感情」，並說明他的「由衷的歉意」[注二十]。

然而，村山富市的道歉卻是個人的，因為他沒有正式地或以官方身份來作道歉並無法推進「不戰決議」。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國會議員支持此決議而百分之四十七竟反對。這項村山富市的道歉顯然不受到廣大日本政府官員的贊成。

迄今為止，廣大幸存者或遇難者家屬認為來自日本政府的道歉是不恰當，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表示。在二〇〇六年十月，當安倍晉三首相發表為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所造成的損失道歉，同一時間，有八十位議員從他執政的自民黨參拜靖國神社。

戰爭時期受害者都相信日本的道歉既不是以國家層面作出也不是真誠的，因為道歉只是在個人層面提出，而且日本官員還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紀念犯下嚴重殘害人類罪行的戰犯[注二十一]。

5.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責

以下是日本各高級官員的評論：

1)長野繁，日本的司法部長（一九九四年）說：「太平洋戰爭是解放戰爭……」。

2)聲明「太平洋戰爭是一場解放被殖民的亞洲戰爭」的一項決議，由自由民主黨的二百二十一名成員年於一九九五年在日

因美國領導的盟國不願公審裕仁天皇作為戰犯，許多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民族他們對戰爭罪行是不需負責的。把全盤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都歸咎於背叛了天皇和人民的日本軍隊。

日本政府只正式承認其軍隊所造成的痛苦，日本政府也發出過一些道歉，但其道歉是有限地承認軍隊的罪行，卻不代表國家及議會。對受害國家，日本政府及其議會一直沒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公開道歉。

本國會通過。自民黨亦長期在國會佔主導地位。

3)一名高級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員法政野呂田在二〇〇一年說：「因美國石油和其他禁運日本被迫戰爭」。

4)備受爭議日本電影「默迪卡」(Merdeka)的製片人加瀨英明，在二〇〇一年說：「日本被迫進入二戰為從西方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亞洲」。

6. 否認暴行

以下是日本的高級官員或著名知識份子的語錄：

1)石原慎太郎，前日本內閣部長，在一九九〇年十月接受採訪時，說：「南京大屠殺是一個中國編的謊言」。

2)長野繁，日本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年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

3)藤岡信捷，東京大學教育教授，在一九九七年說：「美國人戰後把日本洗腦後來相信他們犯下了可怕的戰爭罪行」。

4)鷲尾英一郎，與一批日本政治家否認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殺，說：「我們要傳給年輕人真實歷史。我們必須對著世界其他地區打這種資訊化戰爭」。

5)梶山弘志，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在一九九七年說：「被日軍妓院徵召的外籍『慰安婦』本是妓女」。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和準確性

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運動開始用兩篇文章：山本七平的「回覆本多勝一」[注二十二]和鈴木章的「南京大屠殺的幽靈」[注二十三]。

然後由田中正文寫作的「製造南京大屠殺」[注二十四]。該書否定南京大屠殺，因為他爭辯那時南京的人口少於二十萬。他把中日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政府。

除了完全否定，日方的另一種思路，咬定南京大屠殺是被中國誇張的。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的作品「南京事件」[注二十五]，估計大屠殺遇難者人數為三萬

八千到四萬二千以內。他認為被殺害的投降或被俘兵士，不應計入於「大屠殺」裏。現在這本書已經被日本教育部接受，成為這議題上的官方歷史教科書。重人長野，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稱南京大屠殺是「製造」事件。

一組約一百名自民黨議員在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九日，再次指責南京大屠殺為捏造的，沒有證據證明大規模屠殺是由日本兵幹的。他們指責所稱的事件乃北京的「政治廣告」。

在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名古屋市長河村Takashi，向到訪的南京代表團說：「南京大屠殺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兩天後為了辯護他的言論，說：「自從我當了國會代表，我不斷重複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並導致數百萬人被殺」。

在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說，他也認為南京大屠殺從來沒有發生過。他相信實際死亡人數為一萬左右。

在二〇一四年二月三日，一位NHK廣播公司董事直樹Hyakuta，被引述說大屠殺從未發生過。他說會有個別的殘暴事件，但沒有普遍的暴行。

因為有許多目擊者和證據，南京大屠殺再無法否認：

1)南京大屠殺最早是由居住南京安全區的西方人報告給世界。那時的目擊者像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在他寫給家人的信中說，「平民的屠殺是慘不忍睹。我可用好幾頁來告訴幾乎難以置信的強姦和殘暴案件。七個街道清潔工正坐在總部時，日本兵沒有警告或緣故闖進來殘殺他們。五人即死亡而從被刀刺屍體堆中兩位倖存者帶傷去了醫院」[注二十六]。

另一位目擊者，詹姆斯·麥卡勒姆(James McCallum)，在他給家人的信中寫道：「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知道從哪裏開講或結束。我從來沒有聽到或讀到這類的暴行。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裏至少有

一千宗，還未計算許多白天的。行兇者如遇抵抗或看來是妨礙的，就使用刺刀或子彈」[注二十七]。

2) 田中正明爭辯為南京大屠殺之前的南京人口不足夠二十萬，但根據一九三七年保存在南京的檔案館的普查，關於一九三五年南京市人口的統計，南京人口已經接近九十萬，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六月，人口已經增加到一百零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二人[注二十八]。因此，田中的估計是非常可疑的。

黃弘恩是偽南京政府（由日本控制）立法會議員，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日本朝日新聞主辦的研討會發表講話，說：「（南京）事件以前，……南京人口達到一百零七萬，而在事件發生後，人口大幅降到十七萬」[注二十九]。

3) 吳天威教授發佈的證據來自解密美國政府檔案，其中包括一個編碼電報，由外交部長廣田弘毅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發送到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

發自：東京（廣田）

發往：華盛頓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二二七。從上海收到 # 一七六

自從回到上海，幾天前我調查了日本陸軍在南京和其它地方犯下暴行的有關報導。可靠的目擊者個人口供和信函提供毫無疑問的令人可信的證據，日本軍隊的行為與還在繼續表現好像阿提拉與他的匈奴一般。在冷血情況下，不少於三十萬中國平民遭屠殺、搶劫、強姦，包括年幼孩子們。報告從幾周前敵對行動已停止的地區仍在繼續對無辜平民暴行。這樣應受譴責的行為使駐華日本百姓深切恥辱，在上海當地也發生一系列日軍橫行事件。今天，中國北方新報報導了特別令人作嘔的案件，「一位喝醉的日本兵，無法獲得他要求的女人及酒，開槍殺害了三名年滿六十中國婦女，傷了好幾個無辜的平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有兩個（似乎矛盾的）報

告估計，在佔領進行前六周內，平民和戰俘被殺害有「二十多萬」與「超過十萬」。此數目是按照慈善機構埋葬的記錄——包括紅十字會和崇善堂——由斯邁思提交的研究及倖存者給予的估計。

發出此電報後，日本政府瞭解它的含義會讓世界明白他們的殘酷行為。隨後日方發出另一件電報，並聲稱之前電報以編碼和發送出於一位上海記者兼中國情報部門顧問哈樂德約翰Timperley(Harold John Timperley)。這兩件電報由美國情報截獲而被列在美國政府解密後的檔案中[注三十]。

日方所作出這種斷言是毫無證據，而且也不能證明，曼徹斯特衛報的澳大利亞籍記者怎可能成為中國間諜？哈樂德約翰是西方公認有名望的記者，因他為其報社提供給西方第一手資訊。他從上海所傳的電報於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即奠定了一些早期的南京大屠殺寫作。一名記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日本的外交通訊方式，怎可能冒充外交部長廣田弘毅的名義，發電報到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日本這講法完全是捏造的謊言。

4) 在一九四七年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第六軍指揮官谷壽夫中將時，引述有三十多萬人死亡。估計是從埋葬記錄和目擊者的證明。它的結論是大約十九萬民眾被非法處決在各種執行場所，而十五萬人被一個接一個打死[注三十一]。

5) 據目擊者的講述，南京淪陷後之六周過程中日軍瘋狂地繼續強姦、殺人、盜竊、縱火。最可靠的敘事，來自外國人如約翰·拉貝(John Rabbe)和米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日記。他們為了保護中國平民免遭危害選擇留下來。其餘的，包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真實個人證詞。還有更多的從西方和日本記者的目擊者報告，以及從某些軍事人員搜集的現場日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留下了他的十六毫米電影紀錄片的和南京

戰爭時期受害者都相信日本的道歉既不是以國家層面作出也不是真誠的，因為道歉只是在個人層面提出，而且日本官員還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紀念犯下嚴重殘害人類罪行的戰犯。

日本政府已毀滅了所有慰安婦的證據。研究人員從官方記錄發現一些證據難於海底撈針。儘管如此，日本政府否認慰安婦的責任無法再持續，因為還有很多目擊者和被發現的新證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二〇〇七年表示，否認在二戰期間軍方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他指出：「事實上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所強迫」。當他在說話時候，一群自民黨議員還試圖修改河野談話(一九九三年)。實際上，日本政府已毀滅了所有慰安婦的證據。研究人員從官方記錄發現一些證據難於海底撈針。儘管如此，日本政府否認慰安婦的責任無法再持續，因為還有很多目擊者和被發現的新證據：

1.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吉見義明和弘文林宣佈，從東京審判的檔案中發現七件關於帝國的軍隊正式檔案，如海軍特警隊(Tokkeitai)，強迫婦女去中國、印度支那和印尼的前線妓院工作，因她們父親襲擊了憲兵隊(Kempeitai)。其文件最初公開在戰爭罪公審中。在文件中，有一名中尉承認自己組織了一個妓院，自己作為顧客經常出入。另有資料指Tokkeitai成員，在街道上逮捕婦女，並實施醫院檢查後把他們送妓院服役[注三十六]。

2.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二日[注三十七]記者梶村太一郎，發現三十件荷蘭政府檔案提交給東京法庭作為證據，證明一九四四年間發生在印尼的馬格朗大規模強迫賣淫事件。

3.在二〇一四年，中國從關東軍的檔案中，交付近八十九個文檔。這些檔案提供了對關東軍在二戰期間和之前，強迫亞洲婦女為前線妓院工作的鐵證[注三十八]。

4.韓國政府於二〇〇七年九月從資料確定招募慰安婦是一個親日派(chinilpa)賣國賊，即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養女裴貞子，証實招募慰安婦是事實[注三十九]。

5.根據美國戰爭資訊的辦事處，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那天，美軍在緬甸密支那淪陷後清剿行動，抓獲二十名韓國慰安婦和兩名日本平民。審訊發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特務抵達韓國以招募韓國少女目的，去日本新佔領的東南亞領土，作『舒適服務』。所謂『服務』本質雖

大屠殺的第一手照片。馬吉在給他的妻子的信提到，「他們不僅殺了所有可找到的囚犯，而且各年齡無數的普通平民……就在前天，非常接近我們的住宅，我們看到他們殺死了一個不幸的傢夥」[注三十二]。

6)日軍佔領南京一天後，由美國駐德國大使在柏林發出一個電報說他聽到了日本駐華大使在德國炫耀日軍從上海推進到南京時，殺害了五十萬中國人。這檔案發現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是最新的美國政府解密檔案。根據檔案研究，「由美國外交官[柏林]發送的電報文指出，估計有五十萬人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州遭到大屠殺」[注三十三]。

7)據日軍中校太田俊夫，從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八日之間，南京港的日本指揮部處置十萬具屍體，而其他部隊處理掉五十萬具[注三十四]。

8)以下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佔領的第一個月時期，大約二十萬個案發生在全市範圍內，……總數有超過二十萬人為平民與囚禁戰俘，六個星期內在南京被殺害……這些數字並沒有計算那些屍體被日方焚燒毀滅或拋入長江的，或以其他處置方式的。

·二十萬數目是基於幾個人道援助團體和慈善組織的記錄，以一星期至四個月內所埋在大屠殺展開後的屍體。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個慈善機構埋葬一共十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具屍體。詳細的埋葬記錄仍然存在。

·判決所述之二十萬數，不包括被日方棄置的遇難者屍體（在大屠殺初期常見）或慈善團體以外的個別中國人所埋，也不包括那些死於屠殺持續六周後的。因此，二十萬只是一個保守的數目。再加上一系列小規模屠殺，以及屍首已被其他人埋葬的，總數超過三十萬中國人被屠殺在南京[注三十五]。

有關慰安婦的真相

沒規定，但可假定工作在醫院探訪傷兵，紮繃帶，使一般戰士高興起來」。「大概有八百少女被招募，並分發到緬甸各部的日軍營附近。基本上使用虛假陳述，日本特務招募很多女孩子，先接收幾百日元獎賞並被帶到海外。其交易的條件是屬軍隊監管。可是，女孩們被欺騙成為慰安婦。他們必須在軍規下服役，每天需要服務許多士兵和軍官。他們被迫當性奴隸」[注四十]。

還有許多其他倖存者的目擊證據，可揭開日本政府所犯的罪惡。在戰爭期間，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的，怎麼可能從成千上萬的非日籍女孩從佔領國家被調動，去服務軍隊而成為性奴隸，會沒有政府的核准與方針嗎？否認這些罪行是一種不道德的態度，並顯示執權者對受害者不負責任。這似乎表明，安倍晉三和他的執政黨是戰犯的接班人。

結論

日本否認和撇清對其歷史戰爭罪責任是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維持與受害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正式對受害國家道歉，事實上是再撒鹽於受害國仍在流血的傷口。日本這做法是在：1) 破壞與受害國家的完整和好及和平；2) 不斷製造與受害國家之間的矛盾；3) 損害其自己的聲譽。

當日本否認或減輕其戰爭罪行的責任，各受害國的人們即可作出結論，今天的日本是認同歷史上戰爭罪行是對的。因此受害國民仍在被侮辱，人權被剝奪。受害方將會繼續增加以敵意和怨恨對日本，因為過去的創傷，從來無法獲取適宜痊癒。

此外，日本不但已摧毀了戰爭罪行的官方檔案，連日本人都被剝奪了知情權去明白真相。官方修改教科書和在靖國神社表彰戰犯，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日本年輕一代認為那些已定罪為戰犯的，截然無任何罪行，這把真相與事實打折扣。這種虛假歷史或不完整的教育，不斷製造並導致了今天日本與受害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如誤

解、仇恨、鬥爭、吵架等等。

日本的誠信因此面臨危機，當它一面自誇促進人權，另一面又否認戰爭罪行的責任。恰恰與戰敗後的德國不同，德國願真誠懺悔及接受戰爭罪行，獲得受害國家的原諒，日本卻拒絕認罪，全面損害自己的誠信。事實上當日本戰犯全被釋放平反，正正顯示被侵犯者的人權未得到補償。只有當日本官方及國會承認這些罪行並道歉，那麼日本才能真實證明自身是支持人權的。

當日本不肯正式公認歷史罪行，那麼日本所謂支持人權的可信性和誠信就盪然無存。美國或其他國家，若有誠心幫助調解國際問題，支持和平與維護人權，他們理應鼓勵日本對受害國家做出公開道歉聲明。如果日本真誠支持人權，便應承擔該責任並為過去剝奪受害國家的人民的人權道歉，此舉動會形成合適條件，讓曾受傷國家得治愈，建立亞洲更加和平與和諧的關係。

（本文是在今年九月北京人權會議提交的論文。原文是英文）。

[注一] “March 1st Movemen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19-03-01.

[注二] David C. Rapoport. “Terrorism and Weapons of the Apocalypse”. In James M. Ludes, Henry Sokolski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Weapons Proliferation: Are We Ready?* Routledge, 2001. Williams, Peter, and Wallace, David. Unit 731. Grafton Books 1989

[注三] Daniel Barenblatt, *A Plague upon Humanity*, 2004, p.xii, 173.

[注四] Yuki Tanaka, Poison Gas, *The Story Japan Would Like to Forge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988, p. 16 - 17.

[注五] “Judgemen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Chapter VIII: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trocities)*. November 1948.

日本否認和撇清對其歷史戰爭罪責任是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維持與受害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正式對受害國家道歉，事實上是再撒鹽於受害國仍在流血的傷口。

當日本否認或減輕其戰爭罪行的責任，各受害國的人們即可作出結論，今天的日本是認同歷史上戰爭罪行是對的。因此受害國民仍在被侮辱，人權被剝奪。過去的創傷，從來無法獲取適宜痊癒。

[注六]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Berghahn Books, 2008. p. 362.

[注七]Zhifen Ju, *Japan's atrocities of conscripting and abusing north China drafte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Paper delivered to June 2002 conference: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注八] David Boggett, "Notes on the Thai-Burma Railway. Part II: Asian Romusha: The Silenced Voices of History" <http://www.kyoto-seika.ac.jp/researchlab/wp/wp-content/uploads/kiyo/pdf-data/no20/da-vid.pdf>, accessed 20 Dec. 2015).

[注九]Huang, Hua-Lun, *The Missing Girls and Women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Infanticide, Forced Prostitution, Political Imprisonment, "Ghost Brides", Runaways and Thrownaways, 1900-2000s*, McFarland, 2012. p. 206.

[注十]de Brouwer, Anne-Marie, *Supra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tersentia, 2005, p.8.

[注十一]Jan Ruff-O' Herne, "Talking Heads" transcriptabc.net.au.

[注十二]R. J. Rummel,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Rutgers University, 1997, Chp.3.

[注十三]R. J. Rummel,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注十四]R. J. Rummel,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Rutgers University, 1997, Chp.3.

[注十五]Edward Russell, *The Knights of Bushido,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ese War Crimes*, Greenhill books, 2002, p.121.

[注十六]Edward Drea, Greg Bradsher and others,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 Introductory Essays*, pub.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DC. 2006 p.9-10.

[注十七]Burning of Confidential Documents by Japanese Government, case no.43, serial 2,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vol. 8; Patrick Clancey, ed. (1948-11-01), "Judgmen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Hyperwar, a hypertex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8, p.1135.

[注十八]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Harper Collins 2000), p. 327, 329-331, 359, and 387-391.

[注十九]Eri Hotta, *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注二十]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Tomiichi Murayam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war's end" (15 August 199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announce/press/pm/murayama/9508.html>.

[注二十一] "PBS. Online NewsHour: I'm Sorry - December 1, 1998".

[注二十二]Shichihei Yamamoto, "Reply to Katsuichi Honda", Every Gentlemen, March 1972.

[注二十三]Akira Suzuki, "The Phantom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Every Gentlemen, April 1972.

[注二十四]Tanaka, Massaki, *Fabrication of Nanjing Massacre*, Nihon Kyobun Sha, 1984.

[注二十五]Robert Wilson, letter to his family, Dec. 15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ed. Martha Lund Smalley,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1997.

[注二十六]James McCallum, letter to his family, December 19, 1937, *ibid*.

[注二十七]James Yin, Shi Young, *The Rape of Nanking, Innovative Publishing group*, 1996, p.278.

[注二十八]*Japanese Aggression Troops' Atrocities in China*, China Military Science Institute, 1986 p.124.

[注二十九]National Archives, Declassified on September 9, 1994. James Yin, Shi Young,

如果日本真誠支持人權，便應承擔該責任並為過去剝奪受害國
家的人權道歉，此舉動會形成合適條件，讓曾受傷國家得治
愈，建立亞洲更加和平與和諧的關係。

The Rape of Nanking, Innovative Publishing group, 1996p.290.

[注三十]Tokushi Kasahara. “Le massacre de Nankin et les mécanismes de sa négation par la classe politique dirigeante” (PDF) (in French). http://www.ihtp.cnrs.fr/sites/ihtp/IMG/pdf_interventionsnankin-francais.pdf accessed 20 Dec.2015).

[注三十一]John Magee, *letter to his wife*, Dec. 19,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ed. Martha Lund Smalley,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1997.

[注三十二]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3.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806.

[注三十三]James Yin, Shi Young, *The Rape of Nanking*, Innovative Publishing group, 1996, p.78, 90.

[注三十四]Robert Cryer, Neil Boister, *Documents on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Charter, Indictment and Judg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Volume 1, p.536-537.

[注三十五]Reij Yoshida, (April 18, 2007). “Evidence documenting sex-slave coercion revealed” . *The Japan Times*. Retrieved 29 June 2014 .Yoshiaki Yoshimi,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Asia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Suzanne O’ Bri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注三十六]Japan Times 2007-05-12.

[注三十七]Justin McCurry, Jonathan Kaiman, “Papers prove Japan forced women into second world war brothels, says China” . www.theguardian.com (The Guardian). Retrieved 28 April 2014.

[注三十八]Bae Ji-sook, 202 Pro-Japanese Collaborators Disclosed, *The Korea Times*, 2007-09-17.

[注三十九] “宋秉峻ら第2期親日反民族行為者202人を選定”，JoongAng Ilbo, 2007.09.17. “日本軍慰安婦を募集したことで悪名高いベ・ジョンジャ”

[注四十]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49*.

The Japanese Denial of War Crimes and Their Effects on Human Rights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uring its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Korea and many places in China, the Japanese committed numerous war crimes. Japan’s denial and excuses of its historical war crime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victimized nations are continual trample of human rights and maintain conflicts between it and victimized nations. By not officially apologizing to the victimized nations, Japan as a nation is rubbing salt against the bleeding wounds of the victimized nations. The integrity of Japan is at risk when it promotes human rights but at the same time rejects its responsibilities in war crimes. Unlike the Germans who repented of their war crimes and received forgiveness from its victimized nations, Japan’s unwillingness to do hurts its integrity. The fact that all of the war criminals in Japan have been release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human rights at that time have been fulfilled, but i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would officially acknowledge and apologize for those crimes, then it would indicate that Japan is truthfully supportive of human rights.

Keywords: Japan, War crimes, Human rights.